

冯景兰的三个关键词

广东韶关有一个著名的风景区：丹霞山，这里产生了一个地理概念：丹霞地貌。丹霞地貌这个概念是地质学家、矿产学家冯景兰提出来的。

1898年，冯景兰出生于河南省唐河县一个书香世家。冯景兰与哥哥冯友兰、妹妹冯恭兰（沅君）在20世纪50年代先后成为一级教授，在学术界享有盛誉。

冯景兰18岁考入北京大学预科，20岁考取公费留学，进入美国科罗拉多矿业学院。本科毕业后，考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攻读矿床学、岩石学和地文学，1923年获得硕士学位，历任中州大学（今河南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等校教授。1949年后复入清华大学，后转进北京地质学院，1957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冯景兰在两广地质、川康滇地质、豫西砂矿地质、黄河及黑龙江流域新构造运动、工程地质学等方面做了大量开创性工作。他提出了“封闭成矿”理论，对矿床共生、成矿控制、成矿规律等进行过精深研究，地质方面的论著多达百篇（部）。

1927年底，冯景兰赴粤北地区从事地质调查，发现此地遍布第三纪（6500万年前~165万年前）红色砂砾岩，当即以当地地名中“丹霞”二字为之命名，此概念后来广为人知，并被国际社会接受。

除了卓越的科学研究，冯景兰还特别专注于大学课堂，培养了大批第一流的地质人才，宋叔和、王鸿祯、张炳熹、马杏垣、池际尚、韩德馨、杨起、郝诒纯等中国



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都曾受教于他。

冯景兰的教学自始至终贯穿着深深的“科学家精神”。他备课一丝不苟，经常在教案里补充新内容；讲课深入浅出、条理分明、生动灵活。除了注重知识的系统性，他也看重课外教学，引导学生从标本和实物中认识印证课堂上所学知识，理解相关理论。

冯景兰的教案总是“与时俱进”，不断地将野外考察获得的第一手资料提炼为理论，在课堂上讲授。他也注意第一时间吸取国外地质学新知识，编成教材，以补充、丰富教学内容。他编写教材一丝不苟，亲自审校，一字一句斟酌、修改，连标点符号都非常用心。

冯景兰对学生要求特别严格，在西南联大地理地质气象系任教时，讲授“矿床学”“地文学”和土木系的“工程地质学”，头一堂课教的材料，第二堂课必提问题，而且会给每位学生的答语一个成绩，记录在卷。如有错误，当面批评，绝不容情。野外考察，他一定会大步走在学生前面，学生们必须紧步才能跟上，行进途中，遇到地质现象就详细讲解，行一路讲一路。对地质专业苟且敷衍、行动畏畏缩缩的学生，他会非常严厉地说：“走不了山路就别干地质！”

好的老师对学生的关怀是全方位的，冯景兰也不例外，他总是希望学生超越自己，觉得只有如此，学术才能进步，国家才能繁荣。曾繁祜是冯景兰早期的学生，在一篇文章中如此说：“冯先生一直关心我的成长。解放以后，我经冯先生介绍来东北工学院地质系任教”。在冯景兰的教育生涯中，类似的事例不胜枚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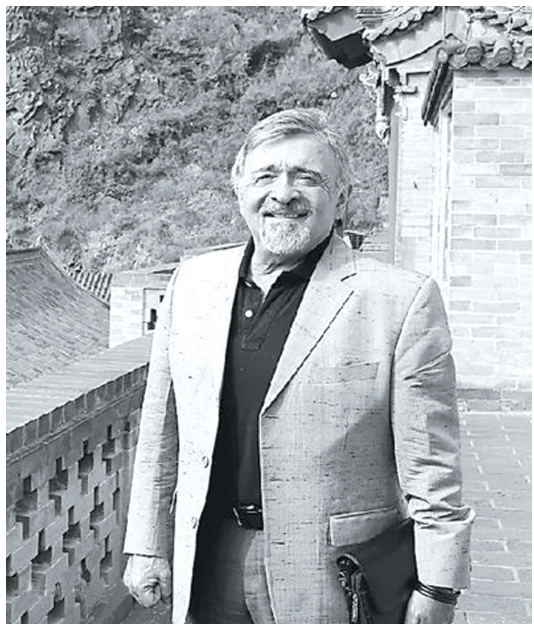
冯景兰的一生其实贯穿了三个关键词：求知、授知、创（造）知（识）。因为矢志不渝地求知，他成了杰出的科学家；由于一丝不苟的授知，他成了卓越的教育人，并在源源不断地求知、授知中最终抵达了创知的境界。

游宇明 据《人民政协报》

汉学家艾恺：由梁漱溟研究走进中国历史文化

谭星

艾恺（Guy S. Alitto）是当今最活跃的美国汉学家之一，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学习中国历史文化，对中国饱含热爱，中国是他心中的“另一个故乡”。艾恺荣休前长期任教于芝加哥大学，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除了专注于梁漱溟研究、中国地方史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和现代化理论研究外，他还开设近代中国研究的课程，致力于传统中国经典选读、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的教学工作，培养了许多对中国研究感兴趣的美国学者，为更多美国学者和公众客观认识中国架设起一座文化交流的桥梁。



通过梁漱溟研究了解近代中国

艾恺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师从史华慈、费正清等中国学研究泰斗，他对中国的研究路径也深受他们的影响，大体上是从小西方文化和历史学进入中国，

渐次至研究中国本身。当时美国汉学家对近现代中国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艾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了梁漱溟研究。梁漱溟对于汉学家艾恺的意义，不只是一个青年学者的崭露头角，也成为他走进悠久而深厚的中国历史文化的一个窗口和路径。

梁漱溟不仅是哲学家、思想家，也是行动者和实践者。作为新儒家的开创者，梁漱溟对于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学术具有特殊的意义。作为“乡村建设派”，他对于理解中国近代农村社会和中国的现代化探索同样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艾恺称梁漱溟为“最后的儒家”，强调他“保持了儒者的传统和骨气”。经过多年研究，艾恺于1979年正式出版了自己关于梁漱溟研究最有分量的专著《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并一举摘得当年美国的费正清东亚研究奖。他用丰富的历史资料、严谨的论断和流畅的文笔，为美国学界和公众展示了一个古老神秘的国度及其历史文化魅力。该著作是海内外第一部研究梁漱溟的学术性传记，美国资深外交官、原美国派驻延安观察组成员谢伟思高度评价此书：“《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是我读过的思想史传记中首屈一指的著作。对中国近代社会、文化以及梁漱溟本人的深入见解在书中比比皆是”。

用口述史记录20世纪中国社会历史变迁

艾恺是一位历史学者，对中国地方史、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较深。出于历史学者的训练和敏锐，他在80年代造访中国时开展了两项重要的口述史研究。一项是对他的传记主人公梁漱溟进行一对一的采访、长谈，另一项是对山东邹平几百名农民进行访谈。

艾恺对梁漱溟的访谈集中在1980年、1984年和1986年，访谈内容现已整理、出版，读者从《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2010）和《这个世界会好吗？续编——梁漱溟晚年口述》（2024）两本书中可知其大概。艾恺完成《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时并无缘见梁漱溟，完全是透过文字认识他，访谈过后，艾恺对他的评价是“表里如一”。对梁漱溟的访谈不仅是印证或修订书中的判断，艾恺也将其观点视为认识近代中国社会历史变迁和理解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一个窗口和路径。对此他有清醒的认识：“我是历史研究者，自然会希望多多保存历史资料，而梁先生……曾经亲身经历、参与过这几十年中国文化剧变，并且和许

多重要知识分子相知相交过。”同时，艾恺认为梁漱溟仍然是一位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通过与梁漱溟的深入交谈，他认识到，善于融合多种思想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典型特质，而中国文化本身就具有很强的包容性。

艾恺对山东邹平农民的访谈主要是在1986年。梁漱溟曾在1931到1937年间在邹平进行乡村建设，这是梁漱溟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时期，身后他选择长眠于此。艾恺研究梁漱溟多年，很自然地关注到邹平。1986年艾恺去邹平进行实地调查，对当地几百位农民进行了访谈，做了录音和记录，他当时集中关注的问题不仅是对梁漱溟和乡村建设的回忆和评价，还对家谱、土改、社会风俗、基层组织等问题十分关注，搜集了大量的一手资料。之后的几十年，艾恺也常到访邹平，目睹了邹平农村的巨大发展，在此基础上他于2018年发表了《历史视野下的邹平》，将邹平视为一个中国农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缩影。

以全球视野认识中华文明的独特性

作为一个意大利裔美籍汉学家，艾恺在美国接受完整的学术训练，又在后半生全身心投入到中国研究中。他具有相当广阔的文化视野，将中国置于世界范围内，以此来理解中国和中华文明的独特性。

在艾恺看来，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和包容性在人类文明进程中独树一帜，是世界上任何其他文明都不具备的独有特征。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体现为中华文明在空间上的极强扩散性，以及时间上的极强持久性。他认为，早期中华文明并未局限于中国古代各个王朝的边界和疆土，而是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传播。直至今日，世界范围内其他文化中的一些成分仍然以中华文明的某些元素为基础。而当中华文明被侵略破坏时，与其他文明最大的不同在于它具有极强的韧性与生命力，总是能够在自身元素的基础上进行自我重建、自我修复。

艾恺谈道，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在与西方文明的比照中突显。他认为，在地中海文明中，无论是政治团体还是宗教组织，都基于非此即彼的二元逻辑，具有很强的排他性。而在中国显然是另一种情况，中国文化具有很强的包容性，譬如古代中国对于战败方的处理方式较为温和，更多采取后续合作和战力吸收的原则。传统中国社会对于民间宗教信仰持一种宽松包容的态度，不同群体间对不同宗教经文的争论，并未像西方的神教文明那样导致严重的暴力斗争。 据《学习时报》